

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

苏金花¹ 蓝迪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内容提要]苗有几何?民又几何?民、苗又为何?由于“民苗分治”和“苗界”不入编审,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黔东南“苗疆”六厅的户口在清政府奏报中存在严重漏记。论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清代初次稽查发生于雍正年间招抚苗寨之时,雍乾起义后清查绝户田产时进行了再度稽核,乾隆朝起便不再编查苗寨居民而只编查屯堡民户,道光后又增加了对苗寨内客民的编查。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黔东南六厅,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混杂并存。随着这些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彼此生存空间的侵占所带来的矛盾,咸同苗民起义爆发,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

[关键词]苗疆;人口;屯堡;雍乾起义;咸同苗民起义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3)04-0063-15

导 言

自雍正年间(1723—1735)开辟苗疆,清王朝将曾作为“化外之地”的黔东南“生苗界”纳入直接管辖,以雷公山为中心设立台拱、清江、古州、丹江、八寨、都江六厅,分属镇远、黎平和都匀三府管辖。起初,接受招抚的苗寨要查造户口、认纳钱粮,但很快爆发的雍乾起义让清廷放弃对苗民征收赋税,也将基层管理之责委任于土官、土弁,不再对六厅苗寨进行户口稽查。^①清代黔东南六厅究竟有多少人口?除了方志中个别年份的记载,也只有开辟之初官员模糊的估测。^②不少前辈学者先后根据户部清册、奏折、地方志书等诸多材料估算过清代贵州省及各府人口,其中梁方仲指出同光年间(1862—1908)镇远、都匀府和八寨、古州诸厅在户部清册奏报中的多次缺失,李中清指出1775年后对西南土司地区的人口漏登,曹树基指出乾隆十四年(1749)对黎平府居住屯所外苗民人口的漏记。^③此类缺漏使得全省及府一级层面的人口数据无法反映一些造成重大区域人口减损的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科研创新项目“清代湘黔苗区的国家治理与人地关系演变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2022—KY—11)支持成果。

[收稿日期]2023-06-29

- ① 清文献之“苗”不同于今苗族,“不相统属”为苗。本文所讨论的“苗民”实含侗、苗、水等族人民,详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 ②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1,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方显著,马国君编著,罗康隆审定:《平苗纪略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 ③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259页;[美]李中清著,林文勋、秦树才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149页;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1—366页;杨斌:《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关于各省民数汇报奏折及其漏报的讨论,见侯杨方《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事件,比如咸同苗民大起义(1855—1872),所缺漏的具体对象和范围也难以辨明。^①各地方志虽有苗、客等各类户籍人口数目的记载,但统计对象不一、时间不明,总难见各厅人口演变之全貌。^②根据奏折、官员日记等材料对黔东南开辟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其中有关户籍与人口的信息较为零散,研究仍少。^③

受启发于何炳棣、姜涛等前辈对清代基层户籍稽查制度的探讨,^④研究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口问题,必须分析其复杂多变的户口稽查政策。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雍乾时缺少可靠的人口记载,以主理苗疆事务官员的奏折和日记估算六厅的人口变化状况;乾隆朝后史料稍多,以贵州省民数奏报整理六厅民户人口,辨析地方文献所载各类户口和民族人口结构特点;咸同后至清末仅古州厅在方志中有较明确记载,据此讨论咸同战乱对人口造成的重要影响。希望通过本文,为学者研究清代黔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人口压力、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撑,并为完善清代厅县级人口数据建设做出些许贡献。

一、雍正开辟之初的“生苗”人口

雍正五年底,时任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八万里古州之地”“倾心内附”。^⑤次年,由鄂尔泰统辖,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张广泗以及黎平、镇远二府官员开始在雷公山周遭的都匀八寨、丹江各寨、九股以及清水江各处化谕招抚,并对抵抗的“顽苗”武力进剿。所招抚的“生苗”各寨要编查户口、认纳钱粮,这是清王朝对苗疆统治的国家化程序,因此主理官员的奏折中多有对苗寨户、口、丁数的记载,以显示招抚的成果。此时“生苗”地界几乎没有客民居住,后来的厅、汛、堡城也仍是苗寨,所招抚之民众既已“化海”,便由“生苗”变为清廷有效统治的民人,但仍以“苗民”谓之。

台拱、清江和古州外围地区以招抚为主。由镇远府、协主导招抚台拱和清江一带苗寨,所呈报的人口信息以户数和“男妇”名、口数为主;由黎平府、协主导招抚古州外围苗寨,所呈报的人口信息以户数和人丁数为主,或仅报有户数。雍正六年十月,镇远府知府方显奏报九股、清水江(大致属台拱、清江厅)一带招抚4470余户,至十二月又新招抚1021户,总共“已投诚五千数百余户”;^⑥

① 参考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表16—1、16—4,第696、713页)的各府人口数据,镇远、黎平、都匀三府的人口和人口密度在1850年前后增长基本平稳。

② 林芊等根据方志整理的清水江流域厅县人口史料,包含除古州、都江之外的四厅,见林芊等《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44页。

③ 与本文讨论相关的有: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第141—174页;杨德芳:《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张姗姗:《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卢树鑫:《论清雍乾之际黔东南苗疆的社会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谭志刚:《雍乾时期贵州苗疆施治述论》,《历史档案》2022年第1期。

④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5—86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1页。

⑤ “八万里古州”即“元时所置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地也”,其地“南自车寨、北抵乐乡”,因元时旧名而习惯称为八万里古州,或称里古州,其外四至各约两三百里地域称为外古州。《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古州彝苗愿附版图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245页。

⑥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张广泗带兵克取小丹江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158—162页。

由镇远邛水司官员、土推官上报招抚共 1 320 户。^① 雍正七年正月,镇远又报招抚九股、清水江约 20 寨 926 户,总数达 7 737 户。同月,清水江高婆、寨稿、加两、龙早等寨(后应属古州外围)接受招抚的共约 5 776 户,古州原本还有最早内附的“南自车寨、北抵乐乡”八万里古州之地,到四月时“近委招抚古州……向化者已六七千户”,^②则古州厅在设厅前所管户口共应有 11 776—12 776 户,与《古州厅志》所载“原奏报招抚苗民”共 571 寨计 11 514 户^③相近。另外,贵州提督杨天纵在雍正七年正月的奏折也有关于招抚苗寨的数目参考,“接壤镇远黎平边界地方清水江各处生苗……者磨、反迷、反号、高婆、寨稿、加两、龙早等”^④共 160 余寨 8 990 余户,与鄂尔泰奏折中地名有重合,减去后四处由黎平知府招抚的、后划属古州厅的 5 776 户,清水江者磨、反迷、反号等清江厅村寨共招抚 3 214 户,那么台拱地区所招抚或有 4 523 户。由于台拱和清江紧邻,奏折中未提及名称的村寨无法判断属于何厅,但台拱和清江在雍正六年底招抚造册的苗民应有 7 737 户左右。表 1 为根据鄂尔泰和张广泗在雍正六年至七年的奏折统计出的所招抚各地苗寨户口情况。

表 1 雍正六年至七年招抚苗寨的户口人丁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名口数 ¹
鄂折雍正六年十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显、 协副将张禹谟	九股及小江羊翁、世盖等 41 寨	台拱	1 777	7 671
	九股之台拱数寨	台拱	210	786
	清水江一带 16 寨	清江	1 590	5 767
土推官杨	九股之交汪等 7 寨	台拱	620	
邛水司副土官袁	清水江之者磨等	清江	700	
鄂折雍正六年十二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	九十月新增不详	台拱/清江	893	
	十一月复招抚	台拱/清江	1 021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	清水江反号等 7 寨	清江	413	1 452
	清水江董敖、九股之陶赖 13 寨	清江	513	2 180
台拱、清江合计			7 737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丁数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黎平府知府张钺报 代理八舟司事吴	高婆等 65 寨	古州	2 793	5 244
	寨稿等 6 寨	古州	510	474

① 其中清水江一带十六寨“编立保甲”,见《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处生苗投诚情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709—712 页。鄂尔泰在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折中报的“四千四百七十余户”与十月二十日奏折所报总数“四千八百九十余户”不符,二者范围都是九股、清水江各地,主理人都是方显,那只能是方显、张禹谟在八九月招抚 3 577 户之后,方又招抚了 893 户,十二月鄂尔泰折未算上十月已报土官袁、杨所招抚的那 1 320 户。

②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复知府张钺方显暨府经历许登第等人操守折》(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第 99—100 页;但古州所化民众“未科粮编户”,见《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陈办理八万古州苗地事宜并缴朱批折》(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910—912 页。

③ 光绪《古州厅志》卷 1《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299 页。

④ 《贵州提督杨天纵奏报丹江等处梗化苗人俱已服罪归诚折》(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4 册,第 357—358 页。

续表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丁数
洪州副司林	加两等 41 寨	古州	1 970	6 840
生员胡	龙早等 6 寨	古州	503	719
鄂折雍正七年四月 据黎平府知府张	古州已化 ²	古州	6 000—7 000	
古州合计			11 776—12 776	
张折雍正六年八月	八寨投诚、招抚 230 余寨	八寨	6 300 余	男女 20 000 余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张广泗	大小丹江 110 余寨	丹江		3 000—4 000

资料来源:根据鄂尔泰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折、张广泗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折、鄂尔泰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折、鄂尔泰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鄂尔泰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折、鄂尔泰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折所报内容整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17—21、222—224、709—712 页;第 14 册,第 158—162、444—447 页;第 15 册,第 99 页。

注:1.原文人口数单位,清代文献通常记“男妇大小□□名口”,名一般用于男性,口一般用于女性;

2.为古州之乐乡至车寨的核心部分,不含高婆、寨稿、加两、龙早等村寨。

台拱和清江厅也有未接受清廷统治的苗民,雍正六年十月鄂尔泰奏九股(台拱)化海者已“十之八九”,^①则另有十之一二未接受招抚,那么台拱厅在设厅前总共应有 5 026—5 654 户。而至雍正六年底据张广泗奏报,镇远府官员称清江一带“情愿归附者已有其半”,^②未受招抚的苗寨包括清江南岸“顽苗之敢于抗拒”的公鹅、柳利、鸡摆尾等十余寨 2 000 余户。^③这些起初不接受招抚的苗寨,清廷或是尽力化导、或是武力征讨,最终必使全部受抚。那么,算上已招抚的 3 214 户,清江厅在设厅前应有 5 214—6 428 户左右。

八寨、丹江、都江均涉及武力剿抚,相关奏折主要记载主理官员的估数或剿罢来降的户数。至雍正六年八月,八寨的招抚起先较顺利,共招抚 230 余寨 6 300 余户,“编过户口、认定钱粮,造册申报”。^④随后有不到 1/10 的村寨“背约”杀害官兵和先前主降的苗民,并“入伙丹江”,于是八月至十月张广泗组织对八寨地区反复的杨牌、杨尧、杨乌、乜告、交归、羊甲、番仰、番扛等苗寨进行剿抚,并由此进剿丹江。丹江地区是反抗清廷最激之处,“共计百余寨”“壮丁有三四千人”并“胁制群苗”“不下六七千人”。^⑤雍正六年十一月间,张广泗率兵继续攻打大小丹江、黄毛、鸡讲等大寨,因清军使用枪炮且焚烧数寨,苗民死伤、逃匿者难以详计,仅有的记载是鸡讲各寨至少有逾千户来降

①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处生苗投诚情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709—712 页。

② 《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办理丹江招抚事宜就绪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4 册,第 275—278 页。

③ 其中惟公鹅一寨被剿灭,《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清江顽苗就抚攻克情形折》(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第 331—332 页。

④ 《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222—224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剿抚贵州丹江生苗情由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347—349 页。

⑤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剿抚贵州丹江生苗情由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347—349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处生苗投诚情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3 册,第 709—712 页。

并认纳钱粮,但未呈报造册的户口数。^① 都江地区在雍正八年方才开辟,几乎没有人口记载。雍正八年二月前后,鄂尔泰调粤兵夹攻、剿抚并用,来牛(后都江厅治)一带“生苗”村寨“投抚认粮”,^②但年底鄂尔泰认为该处未经严剿,常有“伏草伤人、偷牛盗马等事”,加上附近滚踪(后属古州西路)一直未受抚,又派兵进剿来牛、滚踪、定旦一线,都江才算抚定。虽有各寨头人陆续到营“造报户口,情愿纳粮当差”,但也未呈报数目,^③唯有依据《黔南识略》中的“通属苗寨一百有六”估计其数。^④ 如果按表1中邻近的台拱地区寨均约40户估算,那么丹江应有4400户、都江应有4240户左右。

雍正开辟之初的黔东南“苗疆”究竟有多少人口?杨德芳认为李椅《南征日记》言新疆六厅苗蛮“盘踞数十万众”可以理解为三四十万,即六厅约30余万苗族人口。^⑤ 马国君认为方显在《平苗纪略》言古州、八寨、丹江、九股、清水江等生苗地界有“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是指家户有十多万,人口可多至60余万。^⑥ 二数皆源自主理官员估测,类似的估测还有张广泗所报“寨分千余,人丁户口不下拾数万”。^⑦ 即使对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六厅所在各县的总人口加起来约有8万多户38万人,也依然难以判断雍正年间来自官员的估测是否准确。^⑧ 本文根据主理官员鄂尔泰、张广泗和杨天纵等人的奏报,较为谨慎地估算黔东南六厅在设立伊始最低程度的户口数目,区分其中招抚户数和总户数。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等六厅在其设厅之初总共管辖苗民(包括未受招抚)近4万户。如果按表1中那些有详细记载口数、户数的比例(3.6—4.3口/户)估算,总人口数应有14万—17万;因认纳钱粮而查的名、口数可能会忽略部分妇女儿童,那么如果参照含更详尽的雍乾之际清江地区苗民家庭结构信息的《南征日记》,按每户5口估算,最多可达20万人。^⑨

二、雍乾起义前后的人口减损

雍正十三年黔东南爆发的苗民大起义带来了极大的人口减损。这次起义也常被看作清廷“开辟苗疆”所遭抵抗的延续,因为从雍正七年至十年,各处因反抗招安或是堵截水陆而遭进剿的情形从未宁息。不同的是此次起义中有雍正七年已招抚造册的村寨,亦有不少对汛城和周遭各县民村的直接进攻,因此清军的进剿程度比开辟之初更甚,“深远险僻之地,兵威无处不到,剿寨八百有

①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张广泗带兵克取小丹江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158—162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抚丹江一带生苗情形折》(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444—447页。

②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平定旦来牛等处生苗开通都江河路情形折》(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291—296页。

③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抚古州滚踪等处叛苗情形折》(雍正九年四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0册,第309—311页。

④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9《都江通判》,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⑤ 杨德芳:《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

⑥ 方显著,马国君编著,罗康隆审定:《平苗纪略研究》,第110、114页。

⑦ 《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222—224页。

⑧ 剑河、台江、榕江、丹寨、雷山五县,加上三都县的都江部分人口(三合、都江合县前,都江人口约占两县总人口的28%)。贵州省剑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剑河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贵州省台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贵州省丹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寨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贵州省雷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雷山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都水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⑨ 杨德芳:《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

余,皆痛加歼除,有未剿之寨……每寨皆献至数十百余人不等,务期凶逆净尽”。^①按张广泗战后的估计,雍乾起义的苗民总伤亡竟不少于7万之众。(见表2)

表2 雍乾起义镇压、伤俘情况

类别	具体情况	数量
镇压村寨 (寨)	新疆内地附逆悖叛者	1 224
	其中倡谋党恶素称顽悍者,悉经剿毁、痛加歼除	836
伤亡抓俘 (人)	各路临阵斩杀,割有首级、耳计验实者	17 670
	临阵生擒并顺苗擒献赎罪者	25 220
	其中审系首恶要犯应解省质审结案者	400
	其中审明即在军营枭示者	11 130
	其中审后释放之外应充赏为奴的逆犯家属	13 600
	临阵斩杀、枪炮中毙、焚寨、投崖、饿毙不下数万	(20 000,90 000)
	逃匿回寨病毙不止万人	≥10 000
合计不少于		(72 890,142 890)

资料来源:《张广泗奏军务全竣酌撤官兵折》(乾隆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209—211页。

注:“内地”指清平县旧管52寨以及黄平、施秉等县“熟苗”(《张广泗奏攻克上下九股等处苗寨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118—124页)。张广泗认为“内地”被“新疆逆苗”勾结,遂以招抚防范为主,其伤亡远不如“新疆”各地严重,有记载被擒斩的近2000名口,详见《张广泗奏清平等俱已宁贴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张广泗奏清理内地苗民情形折》(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王无党奏进兵九股等情折》(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126—127、204—207、208—209页。

对伤亡的估计源于清军在战后的户口稽查,“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并有十去其八九者,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②负责清江一线的九溪协副将李椅记述了几处清查村寨的详情。以清江的九丢下寨为例,乾隆元年八月,李椅带兵剿毁曾“首先附逆”的九丢下寨,定罪“逆苗”25人、其妻儿家属55人,属22户。九月,通事和头人清查绝户田土,全寨余80户,其中有12户56人是“逆苗”的其他家属(未受牵连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属和个别子女)。^③“逆苗”每户多至6人。凭此估计,九丢下寨原应有90户,雍乾起义后户数减少10户,人口减少80人,已算是伤亡较小的村寨。

人口减损因“悖逆”程度有所差别。“大小丹江、上下九股,为恶最甚……古州、清江、高坡、八寨等处,为恶稍次”,^④八寨虽“为恶稍次”,却还有冒功诱杀降民之事,^⑤且“余孽侵扰边界”;都江地

① 《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折》(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28页。

② 《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折》(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213—228页。

③ 根据《南征日记》九丢下寨所有实名人口统计整理而得,其中“逆苗”妻儿先拿获移解45人,后又陆续抓获10人(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7下一卷9,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496—508、540—573、583—584页)。

④ 《张广泗奏遵旨复议王士俊条陈折》(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189—193页。

⑤ 《张广泗奏参副将冯茂折》(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143—147页。

区“上江地方苗民自有事以来,极为恭顺”,受波及不大。^①清江也有伤亡极大的村寨,南猛寨 2/3 遭擒杀,仅余 41 户,主理官员认为若再继续“尽除凶悍”,所剩人户无多,因此“不必再仿照办理台雄、排咱之法”。^②在台拱、丹江的搜剿更为严酷,初次进剿时,丹江、台拱两地各寨依山险而逃亡众多,后来便被搜山复剿。清军对雍乾起义中“悖叛”村寨镇压之严酷远甚于雍正“开辟”之时,又或可说,在先前已经因顽抗而遭进剿的村寨,到雍正十三年可能已无心无力参与起义,比如“安宁”的都江上江地区和先前为大患、雍正末年却只“俱有百十余户”的柳利、公鹅大寨。^③

战后疫病也是造成人口减损的另一大原因,“凡经兵火之地,无不患病之寨”。^④台拱的交上寨在战乱中原已伤亡惨重,进剿烧杀共 163 口,后又报病死 47 口,“存者无几”;^⑤清江的九甫寨受疫病侵袭更为严重,原 180 户,战乱擒剿 152 口,又病死 172 口,战后稽核时只余 77 户 312 口,“俱卧病难起,稍能支持者不过二三十人”。^⑥这些即为户口“十去八九”“十去五六”的村寨。

按上节估算,如果雍正七年前后六厅初设时登记总人口在 17 万左右,而人口减损(包括充赏为奴而迁移他地)至少在 7 万以上(譬如取中位数 10 万),则人口伤亡约 59%,与张广泗奏折中人口不足原先一半的说法相符合。假设雍乾起义的人口减损高达 14 万,而设厅时还有官员未曾估测到的相当数量的苗寨,那么总人口达 24 万也是有可能的。可以估计,从雍正开辟苗疆至雍乾起义结束,黔东南六厅的人口大致由 17 万—24 万减少至 7 万—10 万。

三、乾嘉道时期户口稽查与民户人口

雍乾起义后,人口减损严重,田多而苗民少,为恢复生产,清政府在黔东南各厅令免苗民赋税,并不再稽查苗民户口,以免引发冲突,各朝只偶尔由土官或头人上报数据,部分迁徙深山的“生苗”更不在统计之列。大量“逆苗绝产”被分给屯军耕种,建成与苗寨间插分布的屯堡。屯军户既有驻军兵丁及其子弟、亟撤归农的贵州新兵,也有就近招募的汉、苗民人。^⑦黔省每年查造上报的总民数虽称包含“汉苗”两类,但黔东南六厅苗民因“番疆苗界不入编审”,无论是已设土司管辖的“熟苗”还是远居深山的“生苗”,户口皆不被编审。^⑧

乾隆四十一年,时任贵州巡抚裴宗锡本欲“确查实在数目,分别汉苗,一体开报”,但乾隆帝旋即谕令“即速停止”,认为苗民“素不知有造报户口之事”,该举“必致猜惧惊惶,罔知所措”,因此裴宗锡和其后数任贵州巡抚每年只将民户按“原编保甲”查实奏报。^⑨这也证明六厅“民户”不包含苗寨居民,仅是住居屯堡的民户或少量住居城内的汉民。但乾隆四十一年对苗寨居民的户口稽查仍在地方志中留下了痕迹,《清江志》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各土官所管苗寨户、口数,极可能是裴宗

① 《尹继善奏贵州军务大局业已就绪折》(乾隆元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147—148 页。

②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6 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407 页。

③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2,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60 页。

④ 《张广泗奏撤兵缘由折》(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201—203 页。

⑤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5 上,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277 页。

⑥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6 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415—417 页。

⑦ 郭松义、桑士光:《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⑧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贵州巡抚爱必达奏报乾隆十四年民数谷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35—0012—040;《清史稿》卷 120《食货一·户口田制》,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486 页。

⑨ 张双智、陈洪毅编著:《清〈圣训〉、〈皇朝经世文编〉选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年版,第 25—26 页。

锡在任时查造却未上报的部分。^①《南征日记》与《清江志》记载之数相距约四十年,清江所属的苗寨总数从雍乾之交的 143 寨,增长到了乾隆中期的 220 寨。^②如表 3 所示,《南征日记》有载而《清江志》仍存的苗寨却大多户数剧减,并未出现通常认为的乾隆时期高速人口增长。李椅的记录已是剿毁后尚存人口,经逐名查讯,殊为可靠,尚存者只有战前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五不等,却在乾隆四十一年所存更少,其原因除了疫病,更可能是绝户田产被分授屯军,挤压了原来苗寨的生存空间。清江地区坡高地狭,一寨难以扩大,只能另垦而居,村寨总数才有可能如此激增。

表 3 乾隆年间清江苗寨户数变化

单位:户

年份	乌沙寨	九甫寨	南岑寨	南冬寨	白汉寨	南孟寨	白谦寨	九甲寨	培鸠寨
1736	125	77	73	14	125	41	60 ¹	68 ²	17
1776	50	30	20	20	40	25	30	20	25

资料来源:根据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第 407、417、588、596、597、599、603 页与乾隆《清江志》卷 4《食货志·户口》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以上 9 寨选取两书皆有记载的村寨,以邻近村寨作为参照印证,南东(南冬)、南猛(南孟)皆为音译不同字。

注:1.另有寡妇 20 户。

2.另有寡妇 4 户。

苗寨居民虽仍未稽查,但屯军户数开始详查。从乾隆四十二年(1776)到五十八年(1793),贵州巡抚每年仲冬上报民数的奏折中增加了对九卫屯军的奏报,表 4 为按年整理的户口数和年增长率。此九卫即清江左、清江右、台拱、台拱属黄施、丹江、丹江属凯里、八寨、古州左、古州右。此外,《清代苗疆屯堡清册》也载九卫屯军原共设 8 937 户,实共 8 944 户,与乾隆四十二年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折中的 8 939 户 38 589 名口最为接近,则《屯堡清册》所记也应是该年各卫屯军的详数。^③

然而,早在乾隆三年(1738)张广泗安设屯军之时,各厅屯堡就已是这等规模,何以四十年来甚至略减,反而从乾隆四十二年起每年新增数十至百余户?^④这可能是因为起初屯军户数固定,即使生齿日繁、乱象丛生,新增人口难以依赖有限的土地生存而只能别居,外来人口也只能寄籍、顶籍与兵丁杂居。^⑤《黔南识略》、光绪《黎平府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古州厅志》等方志所记的屯军户数,也都是乾隆四十二年查造或者说是乾隆三年的“原额”。^⑥到乾隆五十八年后,贵州和其他省份皆未再上呈“民数谷数折”。各厅屯堡的户均人口亦有所差异,乾隆《清江志》记载各屯堡共有

① 乾隆《清江志》卷 4《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2 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25—440 页。

②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2,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54 页;林芊等:《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第 233 页。

③ 8 944 户根据各卫加总而得,古州左卫比原额多 1 户,台拱卫多 6 户,也不排除抄录错误。见佚名辑《清代苗疆屯堡清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4—304 页。

④ “载共安屯 120 处,共安屯军 8 939 户”,乾隆三年十二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苗疆屯田处所并进呈绘图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0811—026;各厅情形详见《张广泗奏革除苗疆派累厘定屯堡章程折》(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244—246 页。

⑤ 郭松义、桑士光:《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⑥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 9《八寨同知》《丹江通判》、卷 13《台拱同知》《清江通判》、卷 22《古州同知》,第 90、94、117、121、181—182 页;光绪《黎平府志》卷 5《武备志·屯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477—479 页;乾隆《镇远府志》卷 20《军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6 册,第 170 页;乾隆《贵州通志》卷 22《兵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 册,第 436—437 页。乾隆《贵州通志》屯卫加总仅 8 579 户,与前引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张广泗折描述相当,应是年中黄平营等尚未设归九卫时之数,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第 192 页。

1 958户 9 117 名口,户均人口约 4.66,略高于九卫屯军 4.3 左右的户均值。^①

表 4 乾嘉年间黔东南六厅九卫屯军民户数

年份	户数	名口数 ¹	户均人口	年增长率(‰)
乾隆三年	8 939			
乾隆四十二年	8 939	38 589	4.32	
乾隆四十三年	9 019	38 954	4.32	9.5
乾隆四十四年	9 130	39 388	4.31	11.1
乾隆四十五年	9 313	39 906	4.28	13.2
乾隆四十六年	9 415	40 397	4.29	12.3
乾隆四十七年	9 561	41 105	4.30	17.5
乾隆四十八年	9 728	41 748	4.29	15.6
乾隆四十九年	9 813	42 114	4.29	8.8
乾隆五十年	9 877	42 626	4.32	12.2
乾隆五十一年	9 940	43 018	4.33	9.2
乾隆五十二年	10 010	43 629	4.36	14.2
乾隆五十三年	10 087	44 228	4.38	13.7
乾隆五十四年	10 168	44 815	4.41	13.3
乾隆五十五年	10 307	45 538	4.42	16.1
乾隆五十六年	10 447	46 089	4.41	12.1
乾隆五十七年	10 582	46 642	4.41	12.0
乾隆五十八年	10 715	47 346	4.42	15.1
嘉庆二十五年	12 918	57 004	4.41	≈6.9 ²

资料来源:乾隆朝数据根据历年贵州巡抚“民数谷数”奏报中“九卫屯军”民户整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0811—026;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01—0368—011、04—01—35—1177—045、04—01—35—1179—018、04—01—35—1181—019、04—01—01—0418—021、04—01—01—0436—013、04—01—01—0448—033、04—01—35—1185—017、04—01—01—0430—046;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5—1988 年版,第 40 辑第 795 页、第 45 辑第 533 页、第 49 辑第 728 页、第 53 辑第 747 页、第 58 辑第 174 页、第 66 辑 149 页、第 70 辑 087 页、第 74 辑 197 页。嘉庆二十五年(1820)数据根据各卫数目相加而成,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02《都匀府》、卷 503《镇远府》、卷 508《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6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27、103 页。

注:1. 原文人口数单位,清代文献通常记“男妇大小□□名口”,名一般用于男性,口一般用于女性。

2. 若嘉庆《重修一统志》关于贵州部分为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的情形,则年均增长率为 8.9‰。

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黔省仍照旧谕对苗寨“无庸编查”,在“苗多于汉之处,悉照旧章,令土弁督帅寨头稽查,按月将并无容留匪类实情赴地方官结报”。^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六厅之九卫在嘉庆二十五年(最早不过嘉庆十九年)共有 12 918 户,男妇大小 57 004 名口,户均口数 4.4 左

① 根据乾隆《清江志》卷 4《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2 册,第 425—427 页)各堡加总而得。

②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贵州巡抚曾燠奏为贵州省编查保甲全竣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01—01—0558—035。

右。这也符合乾隆朝九卫屯军人口增长的规模。然而,单古州的苗寨居民在嘉庆年间就超过 27 000 户,清江在乾隆年间就有 8 320 户,八寨在乾隆初年就有近 5 000 户。^① 因此嘉庆编查时黎平、镇远、都匀府九卫的“民户”与“民数”,实际上并不包含苗寨居民,而仅是九卫居住于屯堡的屯军户。其中古州、清江、八寨三厅苗寨已超 4 万户,而嘉庆所查三厅民户仅 7 614 户,那么嘉庆编查时对此三厅苗民的漏记相当于少统计了约 84% 的人口;假设六厅苗寨当时已达 6 万户,而黎平、镇远、都匀三府嘉庆所查民户共 228 988 户,相当于少统计了约 21% 的人口。^② 这也为回答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对嘉庆二十五年编查是否漏记苗民的问题提供了证据。^③ 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二十五年,九卫民户的人口增长有所减缓,年均增长率从乾隆年间的 8.8‰—17.5‰ 下降至 6.9‰。乾隆时期屯堡人口迅速增长,除了耕作技术、作物、社会环境方面的改善,也有“依傍屯军、潜身汛堡而眈眈苗寨”的外来客民大量涌入的原因。^④

道光年间(1821—1850),外来客民迁入苗寨愈多,难以禁止。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奉谕“查办苗寨内住居汉民,免其驱逐,查明户口田亩,编入保甲”,只是不许再续增人户、续买田土,丹江厅还将屯军和苗寨内客民一概“编联牌内”,但仍没有对苗民户口进行统计。^⑤ 这意味着,从道光六年起,客民也被正式归入民户编查。对客民几乎每年复查,以期管理他们住居苗寨、买当苗产的行为,遏制他们对苗寨田土的侵蚀。汇报客民数目成为每年贵州巡抚上奏的惯例,一直持续到光绪末年,只在咸同年间有所中断。^⑥ 也因此,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的《黔南职方纪略》所载各厅客民安置产类别所造的统计十分详细,却仍无苗寨人口的记录。

表 5 清代黔东南六厅苗、屯、客三类户口统计

厅名	年份	总人口		苗民			屯军(民)		客民	
		户数	口数	寨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清江	雍正六年				6 428		0	0		
	乾隆三年						1 958	9 117		
	乾隆十四年			177			1 918	8 931		
	乾隆四十一年	10 278	50 381	220	8 320	41 264	1 958	9 117		
	乾隆四十二年						1 956	9 108		
	嘉庆二十五年						2 925	12 338		
	道光二十七年						3 522	14 855	593	3 943

① 乾隆《清江志》卷 4《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22 册,第 425—440 页;嘉庆《古州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8 册,第 571 页;乾隆《贵州通志》卷 11《食货·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 册,第 187 页。

② 所查民户数,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02《都匀府》、卷 503《镇远府》、卷 508《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624 册,第 10、27、103 页。

③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5 卷(清时期),第 259 页。

④ 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6《黎平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4 页。

⑤ 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奏为派员查办苗寨内居住汉民户口田亩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朱批奏片,档号 03—2802—039;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5《都匀府》,第 314 页。

⑥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署理贵州巡抚曹鸿勋奏为光绪三十年复查保甲完竣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5519—002。

续表

厅名	年份	总人口		苗民			屯军(民)		客民	
		户数	口数	寨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台拱	雍正六年				5 654		0	0		
	乾隆三年						1 786	7 298		
	乾隆四十二年						1 792	7 322		
	嘉庆二十五年						2 601	10 628		
	道光十三年	13 172	63 149	161	9 891	49 455	2 844	11 622	城内汉民 437	城内汉民 2 072
	道光二十七年						3 132	12 796	214	1 423
	1919	10 691		302	9 622		汉民 1 069			
古州 ¹	雍正六年			454	9 155		0	0		
	乾隆三年						2 519	9 723		
	乾隆三十六年	29 817	146 213	454	27 298	136 490	2 519	9 723		
	乾隆四十二年						2 520	9 727		
	嘉庆四年				27 000	135 000	2 800	10 808		
	嘉庆十九年	30 672	146 436		25 560	122 030	3 435	13 259	1 677	11 147
	道光二十七年			351			4 602	17 762	3 748	24 924
八寨	雍正六年			230	6 300	20 000	0	0		
	乾隆三年	5 723	30 062		4 973	24 865	750	5 197		
	乾隆四十二年						810	5 613		
	嘉庆二十五年						1 254	8 690		
	道光十三年			114			1 371	9 503		
	道光二十七年						1 510	10 463	780	5 187
	丹江	雍正六年			110	4 400		0	0	
乾隆三年							1 780	7 961		
乾隆四十二年							1 866	8 346		
嘉庆二十五年							2 703	12 089		
道光十三年				130	5 300	26 500	2 956	13 219		
道光二十七年							3 254	14 555	1 261	8 386
都江	道光十三年			106	4 240	21 200	0	0		
	道光二十七年			106	4 240	21 200	0	0	466	3 097

资料来源:雍正六年苗民数据根据表 1 整理;雍正六年、乾隆三十六年、嘉庆十九年及光绪三年(1877)古州苗、客数据,见光绪《古州厅志》卷 1《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299、302 页;乾隆三年原额,见乾隆《贵州通志》卷 11《食货·户口》、卷 22《兵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 册,第 187、436 页;乾隆十四年、道光十三年苗民寨、户数,见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 9《八寨同知》《丹江通判》《都江通判》,卷 13《台拱同知》《清江通判》,第 91—95、118、122 页;乾隆四十一年清江数据见乾隆

《清江志》卷4《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第425—440页;乾隆四十二年各厅屯军户口数,见佚名辑《清代苗疆屯堡清册》,第284—304页;嘉庆四年古州数据,见嘉庆《古州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第571页;嘉庆二十五年各厅民户数据,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02《都匀府》、卷503《镇远府》、卷508《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624册,第10、27、103页;道光二十七年客民数据,见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5《都匀府》,卷6《黎平府》《镇远府》,第313—315、324、328页;1919年台拱数据,见《台拱县文献纪要》,《苗蛮》(不分卷),《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0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11页。

说明:斜体为估算值和加总数,估算保留整数;屯军口数取表4中年均增长率和同厅临近年份的口户比估算,古州取8.9%;客民口数按古州嘉庆时户均6.65口,苗民口数按清江乾隆时户均5口估算;都江无屯军,苗民按寨均40户估算;所有整百户口数原文为概数“……余”;因“城内汉民”“汉民”“城乡附廓”等实际名目并不完全符合表目,特别标出;《黔南识略》中清江、古州以外的苗寨数目应为李文耕续写,李于道光十三年在黔致仕,暂记为此年;表中各厅屯军共计九卫。

注:1.光绪《古州厅志》既记载原奏报招抚571寨11514户,又载雍正六年招抚571寨31526户,后者其实是乾隆三十六年数目,因为该年划给下江厅117寨4228户后古州厅实管454寨27298户;按划拨的寨数比例推算,雍正六年同域454寨应有9155户(若按划拨的户数比例推算则有9970户);古州嘉庆十九年合境汉民5112户24406名口分别屯、客记入。

随着客民涌入,道光年间黔东南六厅的民族人口比例自然会有所变化,非苗人口(汉民)究竟增加多少?比例又如何?表5根据各厅方志和《清代苗疆屯堡清册》总结了苗户、屯户、客户三类户口数。以六厅中客民最多的古州为例,在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古州“合境汉民”总共5112户24406口。^①这里汉民应当包括屯堡居民和客民,因为“合境汉民”多于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的“民户”3435户13259口,也远多于道光年间才达3748户的客民。《重修一统志》撰写至嘉庆二十五年,但其中对古州的户口记载很可能就是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的数目,否则古州若有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送报编修一统志,却不载入本地地方志,显得不太合理。根据汉民“仅及苗民十之二”,^②可推测苗民约有25560户122030口。^③实际上乾嘉时记载的古州苗寨已逾27000户,嘉庆十九年苗民户数也不应少于此,因此汉民(包括客户和屯户)占总人口的15%—17%。

若汉、屯之差即为客民,那么嘉庆十九年时客民就有1677户11147口。客民户均人口达6.65,远超屯堡民户每户3.86口。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客民达3748户约24924口(按户均6.65口计算),较嘉庆十九年年均增长率约24.7%,翻了一番还多;若屯堡居民还按年均8.9%增长至约4602户17762口,则总共汉民约有8350户42686口。即使苗民不增长,古州厅总人口至少有33910户164716口(户均4.86口),道光二十七年汉民最多可占古州总人口的26%,较嘉庆十九年有不小增长,但仍远低于乾嘉之际湘西三厅的比例。^④

四、咸同起义后的古州厅

虽然从黎平、镇远、都匀三府数据上看,黔东南人口增长平缓,似乎19世纪中期的咸同苗民起义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口减损,^⑤但方志所记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光绪三年距离“乙卯(咸丰五年)变乱”二十余年,安定不过数年,“苗民累经创虐,痍疫继之,死者过半,其完好者惟洛本保往遂五里

① 光绪《古州厅志》卷1《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第302页。同书第317页“合境汉民共(五)千一百一十二户”之语则有漏字,以第302页为准。

② 光绪《古州厅志》卷1《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第302页。

③ 该数字的估测同《榕江县志》,见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第30页。

④ 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凤凰厅已编甲民户共有51382口,而苗寨户有31221口,非苗人口占62.2%,见乾隆《凤凰厅志》卷11《赋役·户口》,民国十九年钞本,第8—9页。嘉庆凤凰、永绥、乾州等厅汉人比例约为30%,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时期(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页。

⑤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表16—1,第696页。

与高平寨之民……汉民聚守城中,饥馑锋镝……度仅十存一二”,^①已“十室九空,苗汉俱弊”,而苗寨“周历按稽不及十之二三”。^②咸同苗民大起义持续十数年,六厅皆经战乱,人口减损严重,在各厅方志中惟古州厅有较临近的人口统计,或可以此窥见六厅之情。

光绪二年,余泽春出任古州厅同知,“于丙子秋假守是邦,周历四境,力行保甲,稽查户口”,稽查包括住居村寨或城乡附廓的所有汉、苗户口,统计各处户数和丁口,^③这也是六厅苗寨首次被正式归入保甲稽查。^④此次不像乾隆《清江志》那样按土司管辖区域编查,也不像道光年间专统计客户,反倒有些接近现代按城乡村落、街道统计户口,也就难以区分出客民。《古州厅志》既载各类户口总数(堡寨户 14 644 户、丁口 52 899,城内外附郭户 1 200 户、丁口 4 638,总计 15 844 户 57 537 丁口),又详细记载了各寨、街、汛城的户数和丁口数,并标注其中的“生苗”村寨。^⑤《古州厅志》所载“丁口”极有可能是口数,而非丁数,原因有二:一是方志存在“共计男妇大小□万□千□百□十□丁口”此类表述;二是黔东南苗寨居民本就不纳粮当差(至少不正式地纳粮当差),缺乏他省只记纳税成丁而忽略实际人口的动机。

根据各寨、街、汛城详细户口统计数,光绪三年的编查中,记有户口数的地点共有 359 处,约 15 899 户 54 315 丁口,与厅志记载的总数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应该是当时计算上的偏差。其中标注为“西南路生苗”的约 49 寨(约 1 458 户 4 284 口)。^⑥从雍正至光绪,大多苗寨已不再被称作生苗,加两寨这样仍被视作生苗的属于少数。这 359 处地名绝大多数能在《榕江县地名志》中找到,经与现代地名比对,发现并未包含任何屯堡或屯堡所在原寨之名,那么该分寨户口统计也并未包含屯堡居民。^⑦表 6 分列出乾隆原额户数和光绪三年各屯堡户数,光绪三年分堡统计加总共有 2 372 户,两卫总计较乾隆初额减少了 148 户,其中义正堡减少 1 户备注有“水冲坏殆尽”、玉麟堡从 85 户减至 53 户、建威堡从 60 户减至 25 户,且古州右卫的普安、顺宁等堡内皆稍有分化,可见该记载更可能是光绪三年编志稽查时的实数,而非沿述乾隆初的原额,更与嘉道年间实际屯军民户数相差甚远。^⑧另外,《黎平府志》亦记载屯军户数,但有些堡户数与《古州厅志》相同、有些与乾隆原额相同,即便将《古州厅志》可能漏记的归德堡 40 户、丰裕堡 30 户加上,光绪三年屯堡户数亦仅有 2 442 户,比乾隆时少 78 户。^⑨

① 光绪《古州厅志》卷 1《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302 页。其中洛、本、保里即有名的三里七十二寨团练,在抵御“斋苗”上起了重要作用,详见卢树鑫《再造土司:清代黔东南的社会治理及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9—221 页。

② 光绪《古州厅志》卷 3《田赋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314 页。关于咸同苗民起义情形,详见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增订本),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1—278、313—315 页。

③ 光绪《古州厅志》卷 3《田赋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314—317 页。

④ 光绪后苗民虽被正式编入保甲归流,但清末贵州“查编保甲”折亦只汇报民数和客民数。

⑤ 光绪《古州厅志》卷 1《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299 页;同页还有“五百二十六寨计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二户”之语,但只实记有 277 寨,且寨名与光绪三年编查时有所出入,故该条应是乾隆三十六年后至咸同以前某年情形,难以确定年份;同书第 317 页还有“城厢内外户口总共一千六百零”之语,但总户数和丁口数有缺,如“……百□十□丁口”,难以判断其实质。

⑥ 分寨户数根据《古州厅志》卷 3《田赋志·户口》详载的各寨户数统计而得。

⑦ 榕江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凯里市第一印刷厂 1987 年印行。唯一例外是《古州厅志》载有滚纵各寨户口,但数目与玉麟、嘉会不同。

⑧ 光绪《古州厅志》卷 1《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296 页。

⑨ 光绪《黎平府志》卷 5 上《武备志·屯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7 册,第 478 页。

表6 乾隆、光绪年间古州厅屯军各堡民户

卫名	乾隆三年—四十二年		光绪三年		原寨名
	屯堡名	户数	屯堡名	户数	
古州左卫 22 堡	恩荣堡	200	恩荣堡	200	三保寨
	德化堡	21	德化堡	21	三保寨
	兴隆堡	335	兴隆堡	335	三保寨
	增盛堡	50	增胜堡	50	三保寨
	升平堡	50	升平堡	50	三保寨
	安乐堡	100	安乐堡	100	三保寨
	忠诚堡	200	忠诚堡	200	三保寨
	和顺堡	50	和顺堡	50	三保寨
	永清堡	50	永清堡	50	三保寨
	仁育堡	56	仁育堡	56	三保寨
	义正堡	13	义正堡	12	三保寨
	锡庆堡	40	锡庆堡	40	俾受寨(俾寨)
	长治堡	20	长治堡	20	军加寨
	修文堡	40	修文堡	40	江边寨
	太平堡	20	太平堡	20	贾头寨
	鸣凤堡	32	鸣凤堡	30	加欧寨
	怀来堡	40	怀来堡	42	邦受寨
	玉麟堡	85	玉麟堡	53	滚宗(纵)寨
	嘉会堡	80	嘉会堡	80	滚宗(纵)寨
	清宁堡	100	清宁堡	100	好有(孖西)寨
	镇安堡	50	镇安堡	50	乌婆寨
	靖远堡	50	靖远堡	50	乌婆寨
古州右卫 18 堡	寿昌堡	40	寿昌堡	40	岑台寨
	泰元堡	50	泰元堡	50	八(巴)斗寨
	咸亨堡	25	咸亨堡	25	岑翁寨
	富有堡	40	富有堡	40	圭翁寨
	普安堡	90	普安上下三堡	50	山婆寨
	敦厚上下二堡		敦厚堡	40	山婆寨
	敦仁堡	50	敦仁堡	50	岭贾寨(岭寨)
	崇义堡	50	崇义堡	50	岭你寨
	维新堡	20	维新堡	10	寨倒(例)寨
	福善二 丰裕堡	100	福善上下二堡	70	高婆寨
			—	—	高婆寨
	顺宁堡 归德堡	100	顺宁上下二堡	60	高表寨
			—	—	高表寨
	平定堡	57	平定堡	57	乌弓寨
	建威堡	60	建威堡	25	八妹寨
	信诚堡 升恒堡	100	信诚上下二堡	60	色同寨
升恒堡			40	色同寨	
宣化堡	56	宣化堡	56	巨里寨	
合计		2 520	2 372		

资料来源:佚名辑:《清代苗疆屯堡清册》,第 284—288 页;光绪《古州厅志》卷 3《田赋志·屯政》,《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328 页。

咸同起义二十年后,苗寨户口剧减,相比之下,屯堡户数几乎没有减少,这当然不是因为屯堡在战乱中伤亡更少,相反,作为“盘剥勾引更甚于客民远矣”^①的屯户,在起义中受创尤重。由于军事政治原因,屯军较先以旧制重新招设、恢复生产,其户口规模也先行恢复。那么,加上屯军 2 442 户(按道光二十七年户均 3.86 口算,约有 9 426 口),光绪三年古州厅总人口应有约 18 286 户 66 963 口(户均 3.66),其中汉民(屯堡、城乡附廓)共 3 642 户 14 064 口,约占总人口的 21%。

即便已经休养生息数年,咸同后古州厅的总人口相较于道光年间减损也极其严重,总人口减少了近 59%,倒退至乾隆前期的水平,户均口数也下降近 25%;汉民人口减少 67%,汉民占总人口比例下降 5 个百分点,苗民人口较嘉庆时减少 57%—61%。清代全国各地在乾嘉年间的人口剧增和咸同年间的人口锐减同样也发生在黔东南“苗疆”。

结 语

由于“苗界”不入编审,在清政府的户口奏报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厅人口漏记极为严重。与同府所辖其它县相比,六厅由土官稽查、不受编审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极高,所以对“苗民”人口的漏记几乎等同于对全六厅人口的漏记,以致于那些影响本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法从全国、省、府级数据上得以反映。奏折虽提供了较详细和真实的数据,但由于官员奏报的局部性和各厅辖域的变化,这种估算并不完善,只可视作当时所管辖户口数量的最低值;锚定年均增长率或户均、寨均人口数进行估算也会受到多种因素扰动,只能尽可能采用相近的参照。但无论采取何种估算方法,对户口统计对象和时间的判定都是极为重要的前提。

自雍正年间开辟苗疆,清王朝得以正式统御黔东南原为“生苗”的“新疆”之民,对其稽查户口、起科纳粮。不过数年,雍乾起义爆发,镇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减损,此后清政府将“逆苗”绝产分给屯军耕种,并转而对苗寨永不征赋,只由土官、土司自行稽查,分民、苗而治。嘉道年间黔东南六厅人口迅速增长,迫于外区域的人口压力,外来客民逐渐增多,客民也被正式纳入保甲编查,归为民户。清代史料中黔东南六厅的“民”“苗”并非只是汉苗民族之别,也并非只是居住堡、寨之别,而是该户是受稽查在册的屯堡户、城内汉户、客户还是土司自行管辖而不受稽查的苗寨户。屯堡住户和客户多数是汉民,也有少部分来自其他民族。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伴随着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黔东南六厅出现了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的混杂并存。随着人口增长,尽管清政府尝试管理屯、苗、汉、客等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生存空间的相互侵占,咸同年间的各方矛盾加上来自官府、土司的非正式剥削,还是激化成了蔓延十余年的战火,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几乎堪比同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江中下游各省产生的影响。

^① 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6《镇远府》,第 327 页。